

红山文化的发现至今已逾百年，百余年来红山考古工作在持续推进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了一些材料积累不平衡的问题，突出地表现为晚期阶段墓葬材料丰富而早、中期阶段遗址材料匮乏，这种不平衡性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红山文化研究整体走向深入的制约因素。可喜的是，2009年至2012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联合对赤峰市魏家窝铺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一系列引人瞩目的重要收获。经过多年的潜心整理之后，学界翘首以盼的魏家窝铺遗址发掘报告于2025年3月正式出版，使得诸多过去限于材料而无法深入的问题获得了解决的契机。在此，笔者以该遗址红山文化早期单位包含的其他文化因素为切入点，探讨红山文化早期阶段（距今6500~6000年）与同时期相关考古学文化的互动关系，以求更为全面地把握红山文化的谱系构成情况。

南向与后冈一期文化的联系

在红山文化早期阶段，与其联系最密切、接触最频繁的当属活跃于华北平原地区的后冈一期文化，这是在魏家窝铺遗址发掘之前学界就已经形成的基本共识。魏家窝铺遗址的发掘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上述两支考古学关系的认识，极具后冈一期文化特征的圈底盆在辽西地区集中出土，使人们惊叹于后冈一期文化北上影响力之大。早在该遗址发掘之初，段天璟等学者已明确地认识到，此处所见圈底盆、三足钵形鼎、双耳鼓腹罐及红顶钵等都具有后冈一期文化的特征。循太行山与燕山北上的后冈一期文化不但向红山文化输入了诸多特点鲜明的陶器类型，甚至还呈现出许多与红山文化交融的现象。这说明二者之间的交流并非是一般所认为的传入与接收的浅层状态，而是已进入到相互认同、彼此融合的深层水平，从而真正地达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状态。

需要补充的是，魏家窝铺遗址中所见后冈一期文化因素不止上述几种。例如，魏家窝铺遗址与河北邯郸市石北口遗址出土泥质敛口深腹盆的形制几乎完全相同（图1:1、4）。魏家窝铺遗址还发现有目前红山文化遗址中仅见的一件圈足罐，上半部饰凹弦纹带，下半部饰指甲形纹（图1:2），形态特征及纹饰组合与石北口遗址H16:15（图1:3）相似。后者虽然底部残缺，但石北口遗址H31出土的类似器物下接圈足。据此推断，红山文化的圈足罐也应是受后冈一期文化影响而产生的。

值得一提的是，后冈一期文化对于红山文化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目用陶器之上，还表现在房址结构等方面。辽西地区年代较早的兴隆洼文化及赵宝沟文化均无灶前挖建狭长火道的传统，至红山文化早期阶段灶与火道的组合一跃成为主流，这种复杂的室内设施当是后冈一期文化的舶来品。可见，后冈一期文化对于红山文化的影响不仅是生活用具，甚至还包括生活方式。至红山文化中期阶段，以釜为代表的后冈一期文化陶器因素几乎集体消失，但灶与火道的组合形式则依然保持着蓬勃的生命力而沿用下来。然而到了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所代表的红山文化晚期阶段，延续时间达千年的长条形火道至此终结，本土传统最终完成了回归。事实上，有无火道可能暗示着房屋内部结构存在差异。灶与火道之上是否存在控制通风与过火的附属设施？这应作为今后田野工作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

西南向与半坡文化的交往

或许是由于空间位置相距较远的原因，红山文化早期与后冈一期文化的联系远较与同时期陕晋豫地区半坡文化紧密。诚如乔梁所言，红山文化中红顶钵、带钮缸及宽带纹等被视作半坡文化影响的因素，实际上多属于半坡文化和后冈一期文化共同拥有一些特征。正因如此，有关红山文化与半坡文化的关系问题并

没有得到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实际上，许多红山文化早期遗址都发现有陶瓮，但由于多不完整，所以这类器物的来源问题也未能引起太多的关注。魏家窝铺遗址出土了一定量完整的陶瓮，它们的出土使学界认识到，红山文化深腹敛口瓮应是由中原地区的半坡文化传入的。毕竟后冈一期文化中基本不见此类器物的踪影，而陶瓮是在半坡文化的哪个阶段输入辽西地区的却无人论及。

魏家窝铺遗址F64和F69均包含两种形态的瓮，一种唇外叠（图1:5），另一种唇外不叠（图1:6）。我们注意到，第二种陶瓮的整体造型与山西省临汾市北撖遗址H34:49（图1:7）极为相似，与之共存的还有半坡文化最具特点的杯形口尖底瓶（图1:8）。戴向明指出，以H34为代表的北撖遗址第一期遗存是关中半坡文化流入晋南等地之后形成的一种地方变体，年代应在半坡文化中期范围内。至少就魏家窝铺遗址而言，这里发现的陶瓮应是在半坡文化中期阶段主要由晋南地区传播而来的，至于具体的路径，限于当前材料的积累水平我们还无法准确地勾勒出来。

西向与鲁家坡一期遗存的接触

鲁家坡一期遗存是河套地区仰韶时代早期兼具半坡文化与后冈一期文化双重特质、同时具有一定自身特色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近来有研究者注意到，鲁家坡一期遗存的个别陶器与红山文化中期陶器相似，据此推断鲁家坡一期遗存半坡文化的驱赶之下可能部分地融入了红山文化之中，这种认识颇具启发意义。

魏家窝铺遗址发掘报告的刊布使我们意识到，鲁家坡一期遗存与红山文化的接触其实早在后者的早期阶段就已经开始了。以内蒙古鄂尔多斯鲁家坡遗址F5出土陶器为例，其中的一件敛口圆肩盆（图1:12）造型与魏家窝铺遗址出土陶盆（图1:9）造型相仿，区别在于前者施绳纹而后者素面。鲁家坡遗址F5出土的敛口折腹罐上施弦纹带，中部安小纽（图1:11），整体风格与魏家窝铺遗址出土同类陶器（图1:10）几乎完全相同。鲁家坡一期遗存应是沿阴山南麓与浑善达克沙地南缘向东挺进的，数百年后，处于晚期的红山文化反其道而行之，向河套地区仰韶时代晚期的庙子沟文化施加了文化影响。这条文化通道正是之后长城地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史前时期区域间文化互动以及历史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东南向与后洼下层文化的交流

后洼下层文化主要分布于辽东半岛东南沿海一带，王月前的研究表明，后洼下层文化的绝对年代处于距今6500~6000年，与红山文化早期年代相当。令人颇为不解的是，尽管这两支考古学文化同处于东北文化区内，但除造型简单的筒形罐外，二者在文化面貌上的共性则并不多，以至于很少有人对它们进行横向的比较分析。令人欣喜的是，魏家窝铺遗址材料的公布为我们重新认识上述问题提供了新的条件。

辽宁东港后洼遗址曾发现一件陶埙，顶部为较小的吹孔，肩部有一较大的音孔（图1:15）。这是当时中国东北地区已知年代最早的吹奏乐器，稍显遗憾的是，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再未见到同类器物。魏家窝铺遗址陶埙（图1:14）的出土既为东北新石器时代音乐史的研究增添了新的资料，又为考察红山文化与后洼下层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实物依据。不难发现上述两件陶埙的共性特征十分明显，只是它们之间的传播影响方向目前还无法准确判断。此外，辽宁大连北吴屯遗址下层出土的一件陶片所饰绞索状纹（图1:13）与魏家窝铺遗址F64出土陶瓮（图1:16）纹饰相同，此类纹饰在辽西地区的兴隆洼文化晚期筒形罐上就已经出现了，之后为赵宝沟文化的陶钵所延续，最终被红山文化所继承，可谓一脉相承、源流清晰。由此来看，后洼下层文化的绞索纹应是红山文化输入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北吴屯遗址下层发现有中国东北地区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无底筒形陶器，红山文化的此类陶器则出现于中期阶段，所以不排除红山文化筒形器的出现与后洼下层文化存在关联的可能。

东北向与左家山下层文化的互动

左家山下层文化集中分布于西流松花江流域，与红山文化占据的辽西地区隔东北平原相望。左家山下层文化的延续时间长达一千余年，与红山文化存在很长的并行发展阶段。在谈及左家山下层文化与红山文化的关系问题时，大家的关注点主要聚焦于二者玉龙的内在联系上。除此之外，陶器也是洞悉两文化互动情况的关键着眼点。

吉林长春元宝沟遗址H5出土遗物较为丰富，其中的一件红顶钵（图1:20）显然不是当地土著因素，这类带有显著红山文化早期阶段特点的器类无疑是辽西区文化向东北腹地渗透的结果。魏家窝铺遗址中即见有许多红顶钵标本（图1:17），只是报告所公布的线图未对“红顶”予以明确表示。元宝沟遗址H5出土动物骨骼的碳十四测年结果为距今 6140 ± 175 年（经树轮校正），同样证明该单位相当于红山文化早期。上述两处遗址出土陶器还互见复线构成的连续折带纹（图1:18、19），早于红山文化的赵宝沟文化不见此类纹饰。长春市左家山遗址T11第③层中也发现了连续折带纹筒形罐，与之共存的一件陶片饰刻几何纹内填之字纹，带有辽西地区赵宝沟文化的时代风格。左家山遗址T11第③层所见情况说明，西流松花江流域复线连续折带纹的出现年代很可能早于辽西地区。换言之，红山文化在左家山下层文化输出影响的同时，后者也将自身因素回馈到前者之中，彼此之间是一种互通有无的双向式交流。

总之，从魏家窝铺遗址出土材料来看，在红山文化早期阶段，周邻多个文化区的文化因素几乎同时汇聚到辽西地区，呈现出一种八方辐辏之势。使得红山文化一出现便形成了多元的文化谱系结构，多方因素的注入极大地提高了红山文化的发展活力，并在此过程中增进了与相关文化区的互通与联系。毋庸置疑，红山文化能够成为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最为发达的考古学文化，与其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胸怀密切相关。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东北地区龙山时代至夏时期的考古学与社会研究”（25CKG008）和国家文物局全国考古人才振兴计划“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北方史前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2024-202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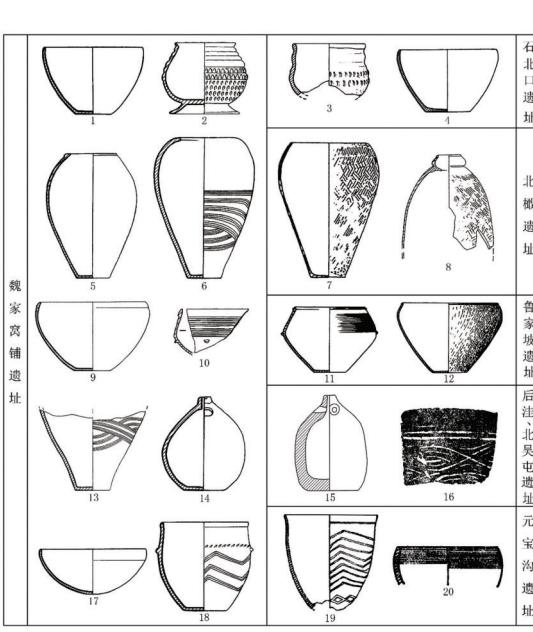


图1 魏家窝铺遗址与其他遗址出土陶器对比图
1、4. 敛口深腹盆(F62:1, H70:16) 2、3. 圈足罐(H15:1, H16:15) 5~7、13. 瓮(F64:5, F64:10, H34:49, F64:14) 8. 小口尖底瓶(H34:27) 9、12. 敞口圆肩盆(F75:8, F52:10) 11. 敞口折腹罐(G3:1:6, F5:4) 14、15. 壶(F46:5, 无编号) 16. 拓片(无编号) 17、20. 红顶钵(F30:22, H5:40) 18、19. 筒形罐(F64:4, H5:25)

本版责编：郭晓蓉 张宸

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之间关系补论：以玉人的比较为例

李彬森

史前时代的跨区域互动一直是考古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时常基于两个相对独立的考古学文化中具有标志性的若干遗存的相似度，来判定两者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交互关系，这也是考古学文化范式中研究文化变迁的立论基础。

《中国文物报》年内刊发了任瑞波、涂令颖、张雷《八“异”与三“疑”：关于红山文明与凌家滩文明关系的若干思考》（《中国文物报》2025年3月11日）一文，提出了很有建设性的思考。该文中作者指出不应仅局限于相同，而相异同样也可说明诸多问题。就以往学界提供的相似性证据中对于玉人的比较，笔者拟进一步抛出问题参与讨论之中。

我们知道从最新的考古发现来看，中国最早的玉器，或称之为用玉传统出现在东北地区。距今9000年左右的小南山遗址，其代表性玉器是玉玦，特点为都是由一些片状切割的玉料制成，玉器的颜色和器类比较单一，可看作是玉文化的源头。随后东北地区（尤其是考古学上的辽西）建立的较为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中，玉器一直是该区域各阶段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特征（至于其他使用玉器的地区是独立起源还是由小南山这个重要的起点经过辽西向外扩散，则是另一个问题）。也就是说，红山文化所在区域中玉器的起源及有序发展是一脉相承的。至红山文化时期，玉器迎来高峰，出现以玉猪龙为代表的诸多器型，就包括本文着重探讨的玉人像。几乎同一时期位于江淮地区的凌家滩文化中也有玉质人像，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两者存在互动关系。

从形制外观上比较，红山文化的人像双臂置于胸前，腹部凸起，两腿并拢似蹲坐状，似乎在表现处于孕育状态的人类（孕育或生产？），而凌家滩的玉人突出表现在双手的动作和面部的表情，整体姿势是站立，双腿微屈，似在表现某种仪式（念咒或作法？）。再仔细观察人像中的细节，红山玉人仅在后颈部有一个穿孔，而凌家滩玉人的穿孔在身体两侧，显示两者玉人的使用方式或有不同。

两者器物组合出土背景也有差异。正如《若干思考》一文所提及的，基本上凌家滩的玉器是作为随葬品或出现在明确为祭祀性质的单位中，与玉人组合的还有玉龟和玉片板，所表现的信息可能在于三种器物共同使

用成为仪式的一部分。红山文化的玉器不仅在墓葬中常见，还见于其他与日常生活相关的遗迹单位，可以认为在日常生活中玉器的参与度也比较高。红山文化不同性质的遗址中玉器的显示度也有所差异，这种分布不均衡的现象或表明两种文化中对于玉器以及玉器组合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分属不同功能和使用情境。

再将玉器放置在各自大的文化传统中去考察，两者玉器文化的传统是相对独立发展的，各有其渊源。红山文化来源于赵宝沟文化，而凌家滩则植根于江淮地区。直接来自北阴阳营的可能性更大。这么看，玉器的起源有其生态因素和地方文化基础，要作为“显赫物品”出现，尤其是位于区域外的传播与接受并成为本地的文化表现形式等问题仍需单独探讨。

而目前对于红山文化这一人像表现形式的“母题”可以在其区域性文化发展中找到源头。至少从兴隆洼文化开始，对于人像的表现横跨石、陶、玉三种材质，表现主题极一致。这种渊源放置在广大欧亚草原的高纬度地区有其文化生态基础。我们把时间线拉长，把空间范围扩大会发现，人类至少从3万年左右就开始刻意用物去表现非实用功能，艺术品独立成为一种物质表现，这种行为明显区别于之前数百万年单纯为制作工具打制的石器。如欧洲出现的洞穴壁画，主要以动物群为观察对象，还有用猛犸象牙雕刻的“史前维纳斯”，以夸张的女性身体表现着他们的认知，这些“女神像”体量小可携带，并普遍在史前欧洲流行。那么，从中国史前考古材料出发，东北地区这种人像传统一直从兴隆洼延续至红山并可能持续影响至燕山南北地区。到红山文化时期发展为以女神形象、积石冢、祭坛为代表的强烈“巫觋”传统。而从广阔的欧亚草原地带外延，至少在欧亚大陆的西亚和中国，两区域在农业起源及定居生活的演进中虽有不同，如陶器是新石器时代的先决条件（如中国），还是不必有陶器就进入“前陶”新石器时代（如西亚）。但整体的文明进程却表现得十分相似，都是在农业定居后发展出早期城市和早期国家等复杂社会。某种程度上在艺术的上看共性也很大，最初都是先集中出现女性形象的陶塑，都有类似于夸张的形体，在艺术表

现上都有动物形象的参与。无论是单独的动物形象还是人和动物的“组合”横跨整个欧亚大陆，甚至在金属时代，其金器、青铜器上的纹饰仍以这些纹样为重要表现形式。

因此，笔者认为当我们关注到史前考古遗存中带有可识别的人或动物形象图像的器物时，不妨先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或人类艺术发展规律的视角看待，再基于两者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提出是否传播的结果就需要谨慎。比如，人类一直追求在陶器、青铜、纸质基质上的二维空间下表现三维和立体，因此只能将所想要塑造的形象做所谓“平面化”处理。以鸟形象为原型，当依托的基质是一个平面的，比如陶器和玉器，自然鸟头就需要看向左侧或右侧，翅膀就被表现为横向铺开状，否则无法完整地将之形象表达出来。只有在依靠陶土做成陶制雕塑时才能表现三维，或至青铜时代我们才看到了更为逼真的金属鸟类形象。古人在不同技术条件下所设计的图像表达，需要根据不同的基质（或称之为材质）和制作技术有所调整。那么也就不能说所有地区的相同构图、设计出的鸟类形象都是由一个原始的点发生并扩散的。我们看与欧亚大陆无法直接交流的美洲文明中的人和动物形象，甚至是玉器也能找到极为相似的表现形式。由此笔者认为红山与凌家滩人在通过玉器这一介质表现人像时不需要相见或沟通就能设计出大同小异的作品。同时，红山文化其他玉质器物表现的猫头鹰（绿松石质）、熊、猴、凌家滩文化的鸟（可能是鹰、秃鹫）和双头猪的组合、龟等是两地古代先民依据对当地动物形象的观察制作的，这些动物形象在两地文化传统中可能代表着不同属性和认识，其器物组合和使用情境也可能不尽相同。当然，对于最为相似的玉猪龙笔者暂倾向于认为可能是两者交互的结果。所以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绝不是为了否认两者的联系，而是探讨两者在何种层面上，何种形式上的相似性是基于交互得来的。至于说究竟是怎样形成的交互，背后的发生机制问题，可能在考古材料层面难以识别，还需要通过更多的证据来论证。诚如《若干思考》一文中所说的那样，需要人类学、民族学中探讨物质文明交换的理论与案例研究来提取和支撑论证。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内蒙古白音长汗遗址带流“石杯”功能蠡测

——新石器时代动物喂养（驯化）的器物观察

李舒涵



图1 1-2. Dietfurt儿童墓葬中出土的喂食器
3-5. 维也纳(Vienna)、沃森多夫(Vösendorf)、弗兰兹豪森-科科伦(Franzhausen-Ko-koron)出土的喂食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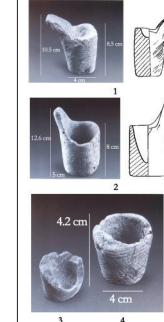


图2 1.BF44 ①:1
2.AF43 ③:11 3.
BT301 ②:6 4.
AF36 ④:2

使用情景是使用人类乳汁来哺育动物幼崽。与易碎的陶器相比，石质器皿具有耐磨损、耐磕碰、耐啃咬，且渗水率更低的优点。这些特性，恰好与喂养动物幼崽这一场景高度契合。兴隆洼文化之时，先民们已经开始对动物驯化的尝试。其中，查海遗址出现了大量猪骨，且死亡年龄集中在成年，发掘报告认为其已经开始了驯养猪的尝试。而在白音长汗遗址，发现野生动物骨骼最多的是鹿科（包括马鹿、斑鹿、狗），其次是野猪，而此种石质喂食器的出现，很可能说明白音长汗二期的先民也开始进行鹿科、野猪等哺乳类动物的驯化过程。先民在狩猎过程中，完全有可能捕获到活的幼崽，为了获得更多肉食资源而尝试对其进行饲养，在此过程中逐渐开始对野生动物的驯化便成为顺理成章的行为。

用石质器皿喂养动物幼崽，其优势显而易见：坚固耐用，可承受幼崽的抓咬和碰撞，使用寿命长。此外，当时尚无其他可供奶源的动物被驯化，哺育幼小的野生动物，唯一的选择便是人类乳汁，而又由于人乳珍贵，石质器皿具有低渗水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浪费。

只不过，对鹿科动物的驯化是一个极其困难且注定失败的过程。由于鹿很难在人工饲养的环境下繁殖，直至近代才探索出完全人工养殖技术。然而，这并不能否定兴隆洼文化先民进行驯化实验的可贵性。白音长汗的石质喂食器，或许正是这一探索阶段的珍贵遗物。相比之下，同属兴隆洼文化的查海遗址已出土了相当数量且年龄结构具有初步驯化特征的猪骨，这或许表明该文化人群在野猪驯养方面取得了实质性成功。两者共同勾勒出一幅从积极探索到部分成功的早期动物驯化图景。

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白音长汗遗址带流“石杯”的形态分析与功能推演，并结合其生业经济背景，提出了一个不同于欧洲“奶瓶”使用情境的解释。我们认为，该“石杯”很可能是在早期动物驯化探索中，用于喂养被捕获哺乳动物幼崽的专用喂食器。石质的选择，是基于喂养对象（动物幼崽）的特性而做出的实用主义决策，旨在满足坚固、耐用的现实需求。

本文的论述主要建立在器物比较与逻辑推演的基础上。其最终证实，仍有赖于未来多学科合作的科技考古工作。例如，若能运用微痕分析技术，观察已经被使用过的“石杯”的“流”部是否存在动物牙齿留下的划痕与磨痕，或通过残留物分析手段提取相关残余，都将验证该假说是否成立。最后，希望本文的思考能抛砖引玉，为相关器物的深入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本文为陕西省教育厅一般专项科研计划项目(24JK0689)、西藏民族大学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202577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藏民族大学]